

「史学史研究」文选

总主编◎杨共乐 本卷主编◎董立河

史学理论卷

「史学史研究」文选

总主编◎杨共乐 本卷主编◎董立河

史学理论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学史研究》文选. 史学理论卷 / 董立河主编.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080-9052-8

I. ①史… II. ①董… III. ①史学史—文集 ②史学理论—文集 IV. ① K091-53 ②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5722 号

《史学史研究》文选. 史学理论卷

总 主 编 杨共乐

本卷主编 董立河

责任编辑 杜晓宇 王 敏 董秀娟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32.25

字 数 545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史学史研究》文选顾问委员会

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吴怀祺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向燕南 李 帆 杨共乐
张昭军 汪高鑫 张 越
周文玖 易 宁 董立河

序

今年是《史学史研究》创办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来,《史学史研究》在培养青年史学研究人才,发表原创性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初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史学史资料》,不定期发行,1964年7月停刊,共出九期。1979年复刊,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1年再次更名为《史学史研究》,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楚图南先生题写刊名,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史学史研究》首任主编为白寿彝先生(1981—2000),主要编辑人员有朱仲玉先生、瞿林东教授、吴怀祺教授、陈其泰教授和许殿才教授等;第二任主编为郑师渠教授(2001—2009),主要编辑人员有吴怀祺教授、许殿才教授、易宁教授和汪高鑫教授(2007年起担任编辑部主任)等;第三任主编为杨共乐教授(2010至今),副主编为李帆教授和易宁教授,编辑部主任为汪高鑫教授,主要编辑人员还有许殿才教授、向燕南教授和周文玖教授等。现主办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承办单位为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史学史研究》作为发表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编纂学研究成果的专门刊物,是国内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主要理论阵地。刊物开辟的栏目非常丰富,主要有:专论、中外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人物志、方志学、史林偶拾、书刊春秋和读书会等。近年来,栏目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增加了“历史理论”专栏,更加重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将中国史学发展史细化为“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三个栏目,不但使中国史学发展史的阶段性更为清晰,内容更加丰富,而且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揭示了中国史学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在“外国史学”栏目中,重视引介西方学人的学术研究与

学术观点,重视对中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比较研究;通过“学术信息”栏目,及时报道海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与研究动态;等等。本刊不但一贯重视刊发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家的学术成果,发挥学科研究的引领作用,而且重视提携后学,中青年学者论文刊用比例较高。

长期以来,本刊一直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史学研究。尽管政治气候经常变化,却能保持不受政治风浪的影响,不迎合时尚,不追赶潮流,不搞实用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者不只是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所以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积极开展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引领学术发展方向。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重视学术求真,追求刊文的原创性,反对言之无物。提倡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对于作者来稿,要求既要有正确的、独到的理论观点,又要充分地占有史料,强调理论与资料的结合,也就是要“言必有物”。

本刊关注理论热点与学术前沿问题,及时反映理论动态。通过“专论”“历史理论”等栏目,发表了大量反映理论前沿动态的文章,起到了引领学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本刊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有:史学在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义、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历史的二重性、历史上统一规模和统一意识、历史教育、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唯物史观、历史规律、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人类精神的觉醒、历史观念、文化反思、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历史文化认同传统以及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其时代性非常鲜明,密切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认识。

本刊在历任主编、主要编辑人员和史学所、历史学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为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在海外也有较高知名度的学术期刊。在国内,本刊通过刊发大量高质量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文,已经成为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发表学术观点的重要平台。同时,本刊重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政治影响。本刊1999年第3期刊发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

志写给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的贺信，祝贺其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这是教育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江总书记关于史学工作重要性的重要论述，是对史学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对促进史学研究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海外，本刊发行到美、俄、英、法、德、意、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而且对当地学者了解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状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本刊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对国外代理中国出版的九千多种期刊中排名前五十位，入选该公司“2015年度中文报刊海外发行最受海外机构欢迎期刊”。

1992年，本刊在全国首次中文核心期刊测定中入选为历史类中文核心期刊，此后每评选皆得入选，现为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源刊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HSPCD）期刊源刊物、美国《历史文摘》（*Historical Abstracts*）和《美国：历史和生活》（*America: History and Life*）摘要与索引的来源期刊，并进入期刊方阵，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双效期刊。

在此刊物创办五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在认真研读《史学史研究》全部刊文的基础上，分类选辑，精心出版《〈史学史研究〉文选》，内容包括《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上、下）、《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和《人物志》（上、下），共七卷，旨在展示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历程。我们对我们的前辈和作者深怀敬意，我们对我们的刊物充满信心。我们将以更大的热忱把《史学史研究》办好，办出水平，办出影响。

杨共乐

2016年9月25日

目录

	白寿彝
1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白寿彝
12	说“疏通知远”
	刘大年
27	面向新世纪，漫谈历史规律问题
	刘家和
38	论通史
	瞿林东
51	关于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几个问题
	陈其泰
71	19 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
	白寿彝
90	说六通
	刘家和
97	从“三代”反思看历史意识的觉醒
	吴怀祺
106	《周易》的意象思维与历史解喻
	晁福林
123	改铸历史：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

	乔治忠
134	中国史学起源问题新论
	蒋重跃
148	从变与常看先秦儒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侯外庐
152	论刘知幾的学术思想
	杨翼骧
167	刘知幾与《史通》
	施 丁
199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许殿才
214	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传统
	汪高鑫
221	经史尊卑论三题
	向燕南
237	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
	周文玖
252	20 世纪史家论历史文学
	张 越
267	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

	张广智
274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三题
	刘林海
283	“教会史之父”尤西比乌的历史思想初探
	王晴佳
294	历史进化思想在西方的形成和演变
	乔治 G. 伊格尔斯 王晴佳
306	历史和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
	艾都拉多·托塔奥罗
324	普遍史 / 世界史：过去、现在和将来
	耿淡如
336	什么是史学史
	于 沛
344	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
	张耕华
351	略论历史归纳中的几个问题
	易 宁
364	关于西方古代史学“实质主义”的思考
	戴维·包丘 (David Boucher)
381	柯灵乌《历史的原理》一书的重要意义

	乔治·伊格斯 (George Iggers)
407	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419	敬复伊格斯教授
	杨共乐
427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
	周建漳
436	语言转向的历史哲学表现和价值
	彭 刚
445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
	左玉河
467	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董立河
490	后一后现代史学理论：一种可能的新范式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白寿彝

时间：1981 年一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来客：客甲，客乙。

客甲：我读过您的《谈史学遗产》，感到中国的史学遗产很丰富，您是不是可以另外多谈一点？

答：那篇文章是 1961 年三月间写的，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这些年，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不断想过，感到可谈的问题很多，不过下功夫研究过的问题还是很少的，我的一些想法也不一定对。

史学在我国有长远的历史，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就是史学家。在殷商时代，那些管占卜的贞人就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也是最早的历史家。我国最早的知识宝库，包括宗教迷信的和科学的，都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我国有一个要求博学的史学传统。《汉书·司马迁传·赞》说：“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这就是说，有了文字就有史官，所有的记载都集中在他们那里，他们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我国古籍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如《诗经》，如《周易》，如《春秋》，都属于史官的职掌。司马迁论战国和汉初的学术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这些著作都是包含了大量历史，采取了历史的资料，研究了历史的问题，结合了当代情况而写成的。司马迁的八书，《汉书》的十

志，还有一些列传，论述了很多专门的学问，其中包含天文、地理、水利、社会经济、军事、法律、学术流派，以及医药、宗教迷信等等。一个历史家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并且在这些知识领域里有相当深度的理解，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近代科学分工分的细了，不能要求一个历史家懂得很多学科，但是也绝不能说一个历史家只有一点历史知识就行了。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历史系，主要课程还只是中外历史的八大块，不要说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就是对于哲学、文学的接触也很少，甚而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段历史，有的还只能教一章一节。我们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比起两千年前的历史家来，在知识渊博方面应该超过他们，不应该比起他们来还显得抱残守缺。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优良传统，我看今天还是要宣传，要继承，要发扬。

史学遗产可谈的很多，有关于历史观点的，有关于历史文献学的，有关于历史研究对象的，有关于历史编纂学的，有关于历史文学的，咱们一下也谈不完，今天咱们先谈哪些呢？

客甲：先谈谈关于历史观点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答：关于这个问题，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前几年，我们在中华书局搞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每一部史书在出版的时候，照例要写一篇出版说明。在出版说明里，总要说说为什么要出这部书，首先就要说说历史观点。这差不多都要指出来作者的思想是英雄史观，是以帝王将相为历史的创造者，是诬蔑农民起义和劳动人民，是历史唯心论。这就是说，作者的历史观点是不足取的。但是，为什么要出版这部书呢？出版说明的笔锋一转，接着就说，这部书在史料上如何有价值。这种写法差不多成为出版说明的一般公式。按照这种写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书，再没有其它的价值了。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

在关于历史观点方面，我想到的有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关于地理环境的看法，关于社会经济的看法，关于得失成败的看法，关于有民主思想内容的看法。另外，总还有一些问题，是我还没有想到的。

客甲：是不是请您按次序给我们一个一个地说说？先谈谈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好吗？

答：所谓历史进程，按现在习惯的说法，是说历史发展过程。因为有的人不承认历史是发展的，所以用历史进程的提法更好些。如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认为历史是永恒不变的，不是发展的。有人承认历史是在变，但还没有进化的思想。也有人有进化的思想，但还没有明确的质变的思想。这些我们都可以不必细谈了。现在只想就“势”和“理”的观点谈一谈，这是关系到对历史规律性的了解的。

按《韩非子·难势》所说，势的概念在慎到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慎到把贤智跟势位对立起来，说“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韩非子吸收了慎到的思想，很重视势的作用，他所谓“贤势之不相容”，同上引慎到的话是一个意思。前些年，一些讲儒法斗争的文章，把势说成是必然性，这是把势的原意夸大了。慎到、韩非所说的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势力，这里是指权力。有的同志把它解释为政权，我看是可以的。《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说：“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形势虽彊，要之以仁义为本。”又说到“彊本干弱枝叶之势”。这里所谓势和形势，也都指的是现实权力，是现实性的东西，不是必然性的。《后汉书》的《党锢列传·序》和《宦者列传·序》是论当时形势的名篇，其中又有提到“不得不”的地方，这也是讲现实的情况，还提不到必然性上。但这里提到了理的概念。如说：“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又说：“假仁以效己，凭义以济功，举中以理，则强梁褫气。”第一个“理”字有必然性的味道，但尚提不到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第二个“理”字，就是另外一个意思，指的是道德规范，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

柳宗元的《封建论》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个“势”字，差不多跟我们今天所说“形势大好”之“势”，意思相同，是说事态发展的情况。柳宗元把势跟“欲”对

立，是说在“封建”这个问题上，客观的形势是不能以主观的意愿去改变的。顾炎武在《郡县论》中说，“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顾炎武的看法比柳宗元更进一步，认为客观形势固然重要，但在形势要起变化的时候，还有待于人力的促成，而人不能安坐以待其变。这种看法，就比柳宗元的看法要周到一些。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开卷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在对郡县的看法上，王夫之认为二千年弗能改，而不重视郡县之弊，这不如顾炎武高明。但他在这里提出了“势”和“理”的关系，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这里是把形势的发展，看作是受理的支配。他虽然还远远谈不到对历史规律的具体分析，但已看到历史进程是有必然性的规律的。他在《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说：“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说“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这段话把“理”和“势”的关系，就说得更清楚。他以理势跟理气相比，这个理是唯物的，不是程朱学派的理。侯外庐同志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二章第八节对王夫之的历史观点分析得很好，可以参考。

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萌芽的思想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客乙：形势，是否还有别的意义，如说“地理形势”之类？

答：顾炎武有《形势论》，就是专从地理上讲的。《汉书·艺文志》于兵家著录“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并说：“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这些话不好懂，似是说利用地理形势以制敌取胜。所著录的图，可能就是地理形势图。这只是我的猜想，不敢说是否符合《汉书·艺文志》的原意。但从传说的历史观点说，中国有不少史家是注重地理条件的。现在我们的谈话，是否就可以转到地理环

境方面去谈谈。

客甲：这些年，我国史学界不大谈地理环境，主要是怕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实际上，这是由于对斯大林著作的误解。

客乙：对了。斯大林在《联共党史》四章二节说地理环境决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主要原因，但是同时又说“地理环境当然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它无疑是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应当全面理解斯大林的意思，您看对不对？

答：我同意您的意见。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不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是正确的。他认为，地理环境是必要条件之一，这也是正确的。而且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还是“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说“必要”，还说“经常”，可见他对地理环境的重视。这些年，不少人因误解斯大林的话，反而不敢谈地理环境，这是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上很不应该有的错误。

近来读到史念海同志《河山集》二集排版的清样，这本书用大量的材料论述了黄河因中下游的侵蚀、下切和淤积而引起的各种地理条件的变化。作者认为不了解这种变化就不好谈有关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使我考虑历史进程中地理环境的问题。

黑格尔有关于地理环境的详细论述。他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他按着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第二种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第三种是跟海相连的海岸区域。跟这三种不同的地理特点相适应，居住着不同文化情况的人民。他说：“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他认为，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人们不能做自由的运动，人们时时刻刻被迫着当心自然，当心着炎日和冰雪，没有力量向更高的方面发展。他关于水的论述，是很有趣的。他说：“结合一切的，再也没有比水更为重要的了，因为国家不过是河川流注的区域。”他又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

动的有限的圈子。”这些话很可以给我们启发，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和西欧历史之不同特点的理解有所帮助。我们在大陆上居住的人，很难对水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的《周易》总是要说“利涉大川”和“不利涉大川”，对于水怀一种害怕的心情。黑格尔的这些论述都见于他的《历史哲学》。他是一个历史唯心论者，但他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还是好的。他也并不想把地理环境的作用抬的过高，他曾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过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它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

马克思在讲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的时候，以劳动对象为简单要素之一。劳动对象，主要是自然条件。马克思对自然条件和劳动生产是辩证地看的。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名文中，还特别提到了灌溉和水利工程对东方国家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对这些国家执行社会职能的重要意义。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土壤、气候、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都属于自然富源。当它们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形成不同程度的生产力。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这些方面是注意得很不够的。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